

后人口转变时期:苏南模式的启示

Thoughts on Birth Control in South Jiangsu Province, China

朱国宏

(复旦大学人口研究所)

继经济发展的“苏南模式”、城镇化发展的“苏南模式”之后,人口学者又提出了人口转变的“苏南模式”,这是很有意义的。对“苏南模式”的概括和探讨,不仅有助于加深理论界对中国独特人口转变道路的认识和理解,而且有助于推动中国现实的人口转变,推动人口控制的深入展开。笔者拟通过对苏南模式的概括和描述,探讨苏南人口转变的现代性及其意义。

人口转变的经验模式和苏南的道路

1. 世界人口转变的经验模式

所谓人口转变,指的是人口出生率变动和死亡率变动的相对的阶段演变。法国现代人口学家兰德里(A. Landry)最早根据出生率变动和死亡率变动的历史趋势对法国的人口变化进行了“三个序列”的划分。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人口转变的“欧洲模式”。根据这一模式,出生率和死亡率的相对变动大致经历五个阶段:出生率和死亡率均极高且几乎不变的高位静止阶段;出生率维持不变,而死亡率开始下降,并引起较快人口增长的早期扩张阶段;死亡率继续下降,出生率也开始下降,人口增长很快的后期扩张阶段;继死亡率达到很低水平后,出生率也降至很低水平的低位静止阶段;出生率继续下降至低于死亡率的减退阶段。其中,人口转变到低位静止阶段后,是否必然走向减退阶段是有争议的。

“欧洲模式”提出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被一些学者用以规范发展中国家的人口变化,并预测发展中国家在战后将进入早期扩张阶段,因而可能引起人口急速增长。全球性的世界卫生普及引致发展中国家人口死亡率下降,而出生率却持高不降,印证了人口转变理论家的预言。其后,“欧洲模式”的人口转变被视为人口发展规律,是发展中国家必由之路。

按照“欧洲模式”,死亡率的下降主要得益于医疗卫生技术的发展和普及。而出生率的下降却有赖于工业化、城市化的兴起和发展。在工业化、城市化过程中,生活水平提高,生活方式变化,社会观念转变,节育避孕运动不仅被逐渐接受,且逐渐成为一种自觉行为,生育意愿由多生育转向少生育甚至不生育,生育率随之大降。

这样,工业化、城市化等现代化因素被看作是人口转变的前提条件,人口转变似乎只有现代化发展起来后才能开始。但是,日本人口转变的史实动摇了这一点。日本人口转变从早期扩张到后期扩张的转变比诸“欧洲模式”快得多,而且是在现代化过程中实现的,而不是现代化发展起来后才开始的;所不同的是,在日本,家庭计划运动广泛开展,并得到了政府的认可。这种在现代化过程中辅之以家庭计划的人口转变道路,被称为“日本模式”。这一模式后来又为新加坡、南朝鲜等“新兴工业化国家”的实践所证实,因而也可称为“新兴工业化国家模式”。

不论是“欧洲模式”还是“新兴工业化国家模式”,其人口转变有一个共同点,即发展现代化。“欧洲模式”是一个自然的转变过程,而“新兴工业化国家模式”则加入了人口控制的干预,因而发生转变是在发展现代化过程之中,而且转变得更快。这样,似乎可得出一个结论,发展现代化是人口转变所必需。不发展现代化单纯依靠人口控制似乎是不可能实现人口转变的,这一点似乎已为许多发展中国家的事实所证明。

2. 中国人口转变模式

中国人口转变道路迥异于世界人口转变的经验模式。首先,在早期扩张阶段,中国死亡率的下降十分迅速,不到10年,已由20‰左右降至10‰以下,但是,在死亡率开始下降的一段“时滞”期之后,并没有经验模式所揭示的那样引致出生率的下降。相反地,当死亡率已下降至10‰以下并持低

徘徊时,出生率持高不降,甚至在60年代前期有较大回升,以致于整个60年代形成出生率很高而死亡率很低的强烈反差,这一反差导致了中国人口的高速增长。其次,从70年代开始的中国人口转变是在现代化水平很低的条件下发生的,其直接诱因是政府推行的人口控制。并且,这一转变之快,出生率下降幅度之大,连“新兴工业化国家”都难以望其项背。最后,在后期扩张之末,中国人口并未朝低位静止的转变完成期发展,而是出现了出生率的回升和波动。由此三点可以认为,中国人口转变从70年代初即已开始,但迄今未完成转变,其道路迥异于经验模式,可称之为“中国人口转变模式”。这一模式的特征是:死亡率下降到一定程度后并未引致出生率的下降;出生率在死亡率下降到很低水平时仍持高不降;出生率的下降主要依赖于人口控制;人口转变到一定程度时出现了波动。

3. 苏南人口转变道路

这里先对人口转变的数量限界作一规定。一般地,高位静止阶段出生率和死亡率都很高,据估计,可能高达50‰左右。在早期扩张阶段,出生率和死亡率分别降至43.7‰和33.7‰,到后期扩张阶段,二者更分别降至20.4‰和10.4‰。其间有一过渡阶段,出生率和死亡率分别为45.7‰和15.7‰。而在低位静止阶段,则同为12.9‰。在当代,由于世界各国死亡率均已降至较低的水平,人口转变主要表现为出生率的转变,一般以30‰和20‰为界线,将高于30‰的出生率称为高出生率,而低于20‰的为低出生率,30~20‰之间则为转变之中。这样,低于20‰的出生率即可视作人口转变的完成。

不妨用以上数量限界来规范苏南人口转变过程。这里所说的苏南是指苏州市及其所辖县市区,包括苏州、吴县、太仓、昆山、吴江、常熟、张家港等10个县市区。

苏南人口转变比诸全国平均趋势要早,有些地区在50年代即已开始,如吴县,建国初期的出生率仍高达36‰,而到1958年已降至23.1‰。只是,这一下降趋势没有持续下去,和全国一样,60年代也出现出生率回升到30‰以上的人口快速增长。1962年吴县的出生率是31.9‰。昆山市1963年出生率甚至高达51.18‰。但在60年代中叶之后,苏州各县市区出生率普遍下降。吴县1966~1970年间平均出生率为27.24‰。吴江县1960~1964年间平均出生率为26.64‰,1965~1973年间为25.82‰。由此可以说,苏南人口转变早在60年代后期即已开始,约早于全国平均趋势10年。

进入70年代,随着人口控制的展开,苏南人口出生率进一步持续下降,并很快降至20‰以下。吴

县1972年出生率已降至13.68‰。太仓1971年降至17.08‰。也就是说,在70年代初,苏南人口已经完成人口转变。在70年代中后期,出生率继续下降,到80年代初已降至很低的水平。下表是1980年的苏南人口出生率。

1980年苏南人口出生率 单位:‰

	吴县	吴江	太仓	昆山	常熟	张家港
出生率	13.25	11.74	8.22	8.49	13.8	10.75

资料来源:引自当地计划生育委员会提供的材料。

由表中可见,苏南人口出生率在1980年已降至相当于人口转变的低位静止阶段的水平,实际上也是发达国家的当代水平。1988年法国是14‰,加拿大是14‰,丹麦是12‰,美国是16‰,瑞典是13‰,日本是11‰,瑞士是12‰,该年度世界人口出生率最低的是意大利为10‰。因此,可以说,苏南人口80年代初的出生率处于低位静止阶段的最前沿,走在世界人口转变的最前列。而进入低位静止阶段的起点则是在70年代初。这无疑是引人注目的。

正如发达国家人口转变发展到低位静止阶段后出现波动一样,苏南人口转变到80年代也出现了波动。这种波动并非由“生育热”使然,而主要是由年龄结构的周期惯性使然,并且,这种波动是基本稳定的。以昆山市为例,1980年以来的出生率变动如下表所示。

1980年以来昆山市人口出生率动态变化 单位:‰

	1980	1981	1982	1983	1984	1985	1986	1987	1988	1989	1990	1991
出生率	8.49	19.55	14.47	7.13	4.36	11.51	16.37	15.77	14.15	14.02	13.49	12.29

资料来源:引自当地计划生育委员会提供的材料。

由表中可见,昆山市人口出生率变动经历了两升两降的过程。80年代初的回升反映了1954~1958年间的生育高峰,当时年平均自然增长率高达2.2%。80年代中后期的第二次回升则反映了1962~1970年间的生育高峰。前已提及,昆山市出生率在1963年曾高达51.18‰,而在1962~1970年间自然增长率高达2.7%以上。两次生育高峰在年龄结构上得到体现,并影响到80年代的生育态势,促成了出生率的两次回升。年龄结构的影响也体现在80年代中期的生育低谷上,1984年昆山市人口出现负增长,这与1960年和1961年的人口负增长是相联系,那两年自然增长率分别为-0.8%和-0.3%,反映在1984年则为-0.18%。

推断80年代出生率波动主要由年龄结构使然,还可以从计划生育率的变化上得到佐证。昆山市计划生育率1980年已达85%,1981年更提高到90%,1983年继续提高到97.6%,1984年以后

则稳定在99%以上。这说明,出生率的波动主要不是由计划外生育引起的。当然,除了年龄结构的影响外,出生率的波动可能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婚姻堆积的状况。如1981年昆山市人口出生率骤升至19.55%,除了生育高峰的影响外,可能还受新婚姻法颁布后引起的婚姻堆积的影响,亦即70年代后期推迟结婚的“大龄青年”和80年代因新婚姻法对婚龄的放松而提前进入婚育期的“低龄青年”堆积在同一年里结婚生育。

由上,苏南人口转变的历程大致可以描述为:第一阶段,整个50年代,死亡率迅速下降至10%以下的低水平,出生率也开始下降,处于转变过程之中;第二阶段,60年代前期,死亡率维持低水平,出生率骤升至高水平,是为转变过程的特殊时期;第三阶段,60年代后期至70年代初,死亡率维持低水平,出生率继续转变,并完成转变;第四阶段,70年代中后期,死亡率维持低水平,出生率更臻降低,达到人口转变的后期静止阶段;第五阶段,80年代以来,死亡率维持低水平,出生率在低水平上波动。

苏南人口转变的现代性

1. “后人口转变时期”的形成

应当如何看待苏南人口转变模式?

通常的观点认为,走在中国人口转变前列的苏南,其人口转变,或者说完成由高出生率低死亡率到低出生率低死亡率的转变,主要是在80年代,主要由经济的迅速发展和人口控制两个因素使然。但此论不确。

之所以认为80年代是苏南人口完成转变的时期,原因在于对人口转变完成阶段标识的认定不是以人口转变经验模式的数量限界为标准,而是以人口控制目标为标准。如以人口控制目标为标准,按照计划生育政策,提倡每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计划生育率提高到90%以上,确实是80年代的事情。但是计划生育率不是判断人口转变是否完成的标志,尽管在其它地方,计划生育率低是人口转变迟未完成的一个原因。

从人口转变历程看,判断人口转变是否完成的标志是出生率变动态势。如前所指出,一般而言,20%以下的出生率即可视为人口转变完成。而出生率降至20%以下,对于苏南来说,早在70年代初就达到了,因而可以说在70年代初苏南已完成人口转变。只是,完成人口转变与实现人口控制目标还有差距,所以在70年代中后期和80年代,人口控制继续施行,并使出生率进一步下降。在完成人口转变历程后继续实行人口控制,以促使出生率进一步下降这一过程,笔者称之为“后人口转

变时期”。主要理由有三,一则苏南人口虽然在70年代初已完成转变,但并非象发达国家所曾经走过的道路那样出现停滞或波动,而是继续下降,直至80年代由于年龄结构作用才开始波动,这种继续转变的特征是独特的,不能用“减退”等特征来形容;二则苏南人口转变不象发达国家那样完成转变后顺其自然,而是继续施行人口控制,使其出生率下降至更低水平,以实现人口控制目标,这一特征也是独特的;三则苏南人口出生率与死亡率的相对变动态势也与发达国家不同,在人口出生率降至苏南80年代初的水平时,发达国家已经出现零增长或负增长,其原因在于有和出生率相同甚至更高的死亡率,而苏南人口死亡率仅约为发达国家的一半左右,所以虽然出生率低,但人口增长仍较快,至于个别地区的个别年份出现负增长,如昆山市1984年,太仓县1983年和1984年,也与发达国家的负增长不同,不是在稳定的年龄结构下形成的,而是由畸形的年龄结构周期惯性使然。这一特征无疑也是独特的。

2. 苏南人口转变的现代性

所谓现代性,指的是一种状态,它是各种性质的综合体,在这里,借用来指苏南人口转变的超前性质,它突出表现在上述的“后人口转变时期”独具的特征上。亦即,苏南人口转变已达到世界发达国家的现代水平,比诸全国平均趋势要早20年左右。

考察苏南人口转变现代性时应予以注意的不仅是苏南人口转变已达到发达国家水平,更重要的是苏南人口转变发生和完成的背景。如前述,苏南人口转变发生在60年代中后期,直接承50年代后期而来。这种转变的背景,一来没有施行人口控制,二来现代化程度较低。如果说中国人口转变模式的重要之处在于现代化程度较低的情况下主要依靠人口控制取得了人口转变的重要进展的话,那么,苏南人口在现代化程度较低并且没有施行人口控制条件下开始转变,就更值得注意了。到70年代初,当全国开始广泛施行人口控制时,苏南人口已经完成了转变历程。这不能不令人深思。

笔者以为,出现这种情况基本原因有三:一是较诸全国平均水平,苏南经济始终是相对发达的,实现人口转变有较好的基础;二是尽管全国性的人口控制迟至70年代初才得以广泛施行,但在此之前,从50年代后期开始,即有多次的计划生育宣传和有关政策指示,这在文化基础较好的苏南地区率先受到了人口控制作为现代生育文化的冲击;三是人口素质较高,容易接受新观念,也容易转变旧观念。但是,这些只是实现人口转变的基本条件,最重要的原因,在笔者看来,却是苏南作为大城市辐射区所具有的各种社会文化功能的作用。

苏南地区,以苏州地区为例,在市辖县之前,吴县、吴江、昆山、张家港、常熟等属于苏州市的辐射范围,而包括苏州市在内的整个苏州地区又受全国特大城市上海的辐射,当然还有无锡、南京等城市的辐射。作为大城市辐射区的意义在于,其社会文化深受大城市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城市生活方式的社会化。作为城市的辐射区,苏南地区居民的生活方式深受大城市居民生活方式的影响,而城市的生活方式是与少生少育的现代生育文化特征相联系的。一是城市价值观念的社会化。不仅物质生活方式受大城市的影响,在精神方面,价值观念、生活准则,乃至伦理道德准则等,也深受城市的影响,而城市居民在生育的价值观念上已经转变到少生优生上,这无疑是有利于转变辐射区的生育观念。

城市辐射区之所以能够在社会化过程中转变生育文化,有其客观的基础:一是地理上的毗邻,交通发达,往来便利,信息传播迅速。在现代通讯日益发达的今天,辐射区的文化环境已成为城市文化的子环境,在诸多特征上非常接近。二是经济上相互依赖。辐射区的经济与城市经济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从某种意义上说,辐射区经济的发展正是由城市经济启动的。就苏南而言,许多乡镇企业本身就是城市企业的分支。之所以有人口转变的苏南模式,与经济发展的苏南模式是分不开的。三是文化上的彼此相通。苏南地区与周围的大城市同属于一个文化圈,有着相通的文化背景,因而一旦城市文化发生变迁,乡镇地区也深受影响。

苏南模式对我国人口控制的意义

前述,苏南人口转变的开始和完成,主要是在没有实施人口控制条件下实现的,即使有也仅限于一般性的、没有严格措施体系保证的计划生育宣传。因为,和全国一样,苏南地区的人口控制也主要始自70年代初,特别是1973年以后,而在1973年,苏南人口转变历程已经完成,开始进入“后人口转变时期”。因此,可以说,苏南人口控制的作用,主要发生在“后人口转变时期”。

在讨论苏南人口“后转变时期”的人口控制作用之前,不妨先考察一下全国的人口控制及其效果。全国的人口控制大抵可分为两个阶段,以1980年“公开信”发表为界线。1980年之前的人口控制主要依靠宣传,控制得不那么严格,而1980年以后,则不断严格,逐步形成了有严密体系的人口控制系统。但在效果上,70年代出生率持续下降,80年代则几次回升波动。

再来看苏南的人口转变。如果说全国趋势中出生率在降至20%左右时出现波动是必然的话,

那么这种必然性不适用于苏南人口转变。大致从1973年开始,苏南人口出生率从20%进一步持续下降,直至与今天发达国家同样低的水平。在80年代也曾出现波动,但前已指出,这是由年龄结构作用使然。从80年代的实践看,苏南地区基本上实现了“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的人口控制目标。这就引出一个问题,为什么苏南人口出生率没有在下降至20%左右出现波动?换言之,苏南地区为什么能够实现人口控制目标?

首先应当指出的是,苏南地区80年代的出生率下降并不是通常所说的人口转变,而是在完成人口转变基础上进一步向人口控制目标接近,即“后人口转变”。

之所以苏南人口能够实现“后人口转变”,而全国平均趋势却迟迟不能开始“后转变时期”,其原因直接地与人口控制分不开。从诸多经验介绍看,苏南地区的计划生育工作非常系统,细致入微,且丝丝入扣,这就保证了人口控制目标的实现。另一方面,应当看到,这种人口控制运作系统之所以有效,是与诸多间接的原因相联系的。在我国的其他一些地方,从计划生育的各项工作来看,应当说,也有着类似的系统,但是有效性却较差。笔者以为,差异的根本所在是,苏南地区的人口控制系统与客观可能性比较吻合,而其他一些地方则不然。因为,以“一胎化”政策目标来衡量,人口控制是相当严格的,没有一定的基础很难奏效。而苏南地区却具备了这种基础。其中最主要的也已被许多人所揭示的是经济的迅速发展。经济发展的成果构成了苏南人口控制的基础,而这一基础是不可或缺的。只是,经济发展不是唯一的原因,从根本的意义上说,更主要的是,由经济发展启动起来的各个方面的现代化。也就是说,在人口控制后面,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各个方面现代化所带来的综合效应。除了生活水平的提高外,与作为城市辐射区的作用是分不开的。频繁的信息流转和文化传播也促使城市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的加速社会化。此外,大城市与辐射区之间劳动力的流动和转移,既活跃了经济,又减轻了人口负担;人口负担的减轻,既提高了生活水平,又改善了生活质量,包括养老制度的建立和完善。所有这些,都为苏南地区人口控制目标的实现提供了可能性和现实性。相比之下,在一些地区,因为缺少大城市辐射这种条件,尽管经济发展很快,但没能启动其它方面的现代化,因而没能产生促进人口控制的现代化综合效应,致使人口控制的有效性较差。

显然,苏南模式是独特的,而其形成又是各种特殊条件下综合效应的产物,因此,它并不具有普遍性,如果盲目地将苏南地区人口控制工作的某

(下转第19页)

仅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中心城的环境问题,却造成郊县的污染加重。

造成上海城市老化的真正根源是产业结构和城市土地利用结构严重失调,以及作为支撑体系的城市与经济管理体制不尽合理。因此,仅仅进行人口疏散和产业疏散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上海的城市老化问题。城市的机能是由城市的结构决定的,城市机能衰退说明城市结构不合理。要从根本上解决上海的城市问题,必须对城市产业结构和土地利用结构进行重大调整。产业结构调整是指将第二产业的人口和资金转向第三产业,特别是将闹市区技术档次低的小型街道企业和污染严重的企业设备和厂房拍卖,人员和资金转向第三产业,就地消化,逐步使第三产业人口超过第二产业人口,达到一个合理的比例(见表4)。土地利用结构调整则是指引进土地有偿使用机制,吸引国内外资金进行土地开发,逐步培育土地市场,利用城市土地级差地租的规律优化土地使用结构,改变以往土地利用不合理的局面,并且积累资金,推动城市运行机制的转变。城市产业结构与土地利用结构调整是相辅相成的,产业结构的调整减少了第二产业的用地,使土地利用结构趋向合理,而土地利用结构调整则会强有力地促进城市产业结构的转换。

2. 都市更新要求城市经济与管理机制转变

在传统体制下,经济发展,特别是工业发展的速度与规模成为考察地方政府政绩的主要指标,同时工业企业上缴利税也是政府财政收入的最主要来源,工业发展必然成为政府部门致力以求的目标。而第三产业与基础设施往往被忽视。

为了在解决上海城市问题的同时谋求城市有一个很大的发展,要求城市经济与管理的运作机制必须有以下几点根本性的转变:

(1) 土地有偿使用 土地有偿使用不仅可以优化城市土地利用结构,而且可以为城市建设和政府财政筹措大量资金。

(2) 确立第三产业的地位 重点发展第三产业不仅可以加强城市的服务功能,吸收大量的就业人员,而且可以减轻第二产业对资源及城市基础设施(如水、电、道路、城市用地等)的压力,还可使上海成为国际金融中心的重要组成部分。

(3) 政府职能由直接经济管理转向宏观调控 随着企业经营机制的转变和土地市场的逐步形成,政府职能将从直接经济管理逐步转向宏观调控和服务,部分政府职能可以企业化。政府财政不必完全依赖工业,国有土地出让可以提供财政的很大部分。

(4) 城市规划应由指导性转变为控制性 在一个市场调节为主的环境中,法律必然成为主要

的规范化手段。为保证城市发展的总体方向和防止土地投机,原有的为政府部门决策参考的城市规划,即指导性规划,将逐步由具有法律效应的控制性规划所代替。

目前,上海新的城市运作机制已在逐步形成,它必将使上海的城市面貌发生重大改变。

3. 土地有偿使用是上海都市更新的启动力

根据国内外经验,都市更新及旧城改造最大的难点在于资金的筹措。都市更新需要巨额资金。一个县城的旧城改造耗资就达2亿元,喏大一个上海则需要数百亿元的资金,政府财政难以负担。但同时,土地隐形市场则使上海每年损失近百亿元。因此,将土地隐形市场公开化,实行城市国有土地有偿出让,转让,来吸引国内外各方资金投入城市开发建设中来,从而弥补政府自身财力的不足,是进行上海都市更新的重要途径。今年初港沪发展公司协议以1.32亿美元承租闸北区一幅面积为5.78公顷土地的使用权。市政府推出黄金地段的黄浦区14幅土地以吸引各方投资营建。土地有偿转让为政府财政提供了一笔可观的资金。

4. 浦东开发为上海都市更新提供了极好的机会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特别是沿海地区),经济发展突飞猛进,但是在整个80年代,上海经济发展远远慢于沿海其它省市。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改革上没有大的动作是重要原因。随着浦东的开发,进入90年代以来上海经济形势明显好转。新区的开发离不开老区的支撑,同时新区的开发也可以带动老区的改造和发展。可以说,浦东开发为上海都市更新提供了一个极好的契机。

(责任编辑 肖庆山)

(上接第59页)

方面经验照搬到其他地区,显然不合适,也不可能成功。但是我们仍然可以从苏南模式的形成中获得丰富的启示。第一,20%左右的出生率不是中国人口出生率的下限,它仍有可能进一步下降,并最终实现人口控制目标;第二,人口转变乃至“后人口转变”的基础是经济发展,没有一定经济基础,人口转变可能很难进入“后转变时期”;第三,人口控制是必要的,也是重要的,它作为一种文化行为,能够推动和加快人口转变历程;第四,人口控制的有效性,既与人口控制本身的运行机制是否完善相联系,更与一系列的社会经济文化条件相联系,人口控制只有和社会经济文化条件相适应,才能形成最大的有效性;第五,重视城市辐射作用,加强城乡交流,促进劳动力流动,推动城市化进程,可能是我国最终完成人口转变、实现人口控制目标的长久之策。

(责任编辑 孙立明)